

王吉鹏 于九涛 荆亚平编著

鲁迅 民族性的定位

——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史

人民出版社

鲁迅民族性的定位

——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史

王吉鹏 于九涛 荆亚平编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鲁迅民族性的定位——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史

著 者	王吉鹏 于九涛 荆亚平
责任编辑	吴兰萍 封面设计 李 云
责任校对	黄元维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吉林省吉新月历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18
印 张	30.625
字 数	49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2731-8/I·144
定 价	48.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前言

在华夏文明的进程中,鲁迅是一座无法绕开的山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鲁迅这座山峰不是突兀的,而是作为一个文化制高点辐射到中国文化的腹地。所以,鲁迅与中国文化形成了无法割舍的联系,即众多学人所说的鲁迅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最为优秀的继承者和批判者,也是中国现代文化、文学最杰出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从文明传承的意义上说,鲁迅又是前承古人、后启来者的文化驿站。

其他同时代文学家和文化人与鲁迅比较,其差距不仅是量的,更是质的。鲁迅以他人格的伟岸、学识的渊博和精神的不朽,逼近世人仰视的高度。无论是在他的学生和朋友、敌人和对手的面前,无论是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时空中,鲁迅都是一个伟大的存在。本书编著者的初衷,就是从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坐标中,进行全方位观照,给鲁迅以民族性的定位。在鲁迅与中国文化的互动体系中,以鲁迅为凭借,纵览几千年中国文化的脉络;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系,体悟鲁迅的博大精深。所以,通过对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史的评述,梳理 80 年来鲁迅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传承鲁迅精神的火种。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经世情怀。任何文化工作,如果不是为民族、国家和人类寻找精神归宿的话,那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 20 世纪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遭遇了太多的困惑,中国两次把目光投向西方,都没有找到根本性的答案。我们致力于鲁迅



与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旨在以鲁迅为渡口,进入中国文化的主航道,感知中国文化的未来流向,为现代化寻找精神的出口。

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我们有这样一种理解,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在学术内容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比较,包括鲁迅与中国文学、鲁迅与儒释道文化和鲁迅与中国历代(包括当下)的文化人的相互影响研究。广义的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除上述以外,还包括鲁迅的藏书、古籍整理及鲁迅与木刻、版画等美术方面的研究,还包括鲁迅与电影的比较研究,以及鲁迅文物典籍收藏研究等诸多方面。此外,鲁迅对前代、同代文化人的评述研究、同代后代文化人对鲁迅的评述研究,等等。本书著者基于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规范上的考虑,采用的是狭义的理解。仅此而言,80年的成果就已琳琅满目,沉甸喜人了。

鲁迅研究是随着其步入文坛而开始的,历时80余年而不衰。但在这80年的时间里,鲁迅研究同样也随着社会历史进程而几起沉浮。20世纪的中国几乎是被政治思潮所左右的,鲁迅的独特的个质又注定他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所以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大的社会思潮的涌现,都会迅速反映到鲁迅研究中,并且影响了鲁迅研究在每一个阶段的研究空间、研究性质和研究特点,所以本书的分期基本上是沿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传统分期方法。但对于“文革”一章的处理上,我们遇到了难题。一是资料搜集的困难。许多资料都随着对那个时代的否定而消失;二是即使资料全了,那些资料也都是在一种思想指导下,以机器工业生产方式加工出来的产品,缺少文化的意义。但是,在“文革”时期,真正能称得上文化活动的,或者惟一具有合法性的学术研究,就是鲁迅研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不管这一时期鲁迅研究有多少不足,鲁迅都是这一时期的文化脐带,使20世纪的中国文化没有断层。本书,就是从这一点来评述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的。

经过多年的资料整理,纵观80余年的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本书编著者认为,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体现出如下规律和特点:从总体上看,这一研究随着中国社会时局的变动而变动,研究性质也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从研究自身发展来看,滥觞于20年代初,40年代学术规范基本形成,经过50年代到70年代的迂回、曲折地探索,在80年代取得空前的学术成就,并且形成了严格的学术规范,开拓成为一门成熟、科学、完



整的学科方向。90年代,研究逐步深化,研究空间日益扩大,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研究视角日趋开阔,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

从这一研究领域本身发展来看,建国前的研究因研究者的层次不同,而使研究状态呈现出多层次、多侧面、立体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虽然学术成就参差不齐,但茅盾、周作人、张定璜、郭沫若、巴人等人的研究还是达到了当时历史的最高成就,以郭沫若的《鲁迅与庄子》、《鲁迅与王国维》两篇专题性研究文章的出现标志着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规范的基本形成。这一时期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基本上是从鲁迅本体出发,给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发展的可能。

建国后17年间,包括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在内的鲁迅研究,由于党的领袖和人民政府的提倡,尤其是广大专家、学者的努力,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有着全面的进展和开拓。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的是注意鲁迅的外部价值,即鲁迅在中国革命斗争和文化战线上的作用,得到了空前的、最为充分的研究,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当然,由于当时中国整体文化状态不成熟,鲁迅的主体内部价值研究得不够充分,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机械唯物论、实用主义的痕迹。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恪守自己的学术品格,如王瑶等人,做出了突出贡献,奠定了新时期以后的研究基础。

“文革”期间,鲁迅研究同样遭受了劫难,“四人帮”把鲁迅作为一根打人的棍子,鲁迅与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成了所谓“批林批孔”、“评法反儒”、“评《水浒》”的工具。但是,也有一些严肃、认真的学者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见解,这些见解虽然有明显的时代印记,毕竟对研究有着难能可贵的推进作用。

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研究,随着思想的解放而全面展开,学术方法也趋于规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体现。虽然研究伊始或多或少带还有五六十年代的影子,但随着研究领域的展开,特别是以鲁迅诞辰百年为契机,出现了一大批质量很高的研究成果。随着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兴起,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也更多地注重鲁迅自身的文化价值。从研究空间来看,已深入到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各个角落,鲁迅与历朝、历代文化的比较研究,都有所触及,涌现一大批有价值的成果。研究最为充分的是鲁迅与郭



沫若、周作人、郁达夫、茅盾等人的比较研究,集中涌现了一大批颇具学术价值的成果。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即鲁迅与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还多是从现象、文本方面进行比较,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90年代以后,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的领域逐步开阔,鲁迅与一些以前未被重视的作家如张爱玲等人的比较研究破土而出。一些课题在“长时段”的概念下得以重新审视,如鲁迅与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关系得到更为深入的挖掘。这一时期的研究,已经深入到文化层面,从作家本体出发,以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解构主义、存在主义等多种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值得欣慰的是,这一时期,鲁迅与当代文化的比较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系列与其在当代文学中的精神后代的比较研究很有学术意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研究领域已进一步拓宽,标志这一研究的深化与发展。

今后的研究中,在如下方面仍有待突破。从研究的广度上看,在鲁迅的文物收藏,如拓片的整理研究、版画的收藏研究,鲁迅与民俗文化、中华区域文化等方面,特别是鲁迅与吴越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秦晋文化等关系的分别研究,还应该进一步深入,并且大有文章可做。在鲁迅与当代文化比较研究方面,仍然较为薄弱,既然中国现当代作家受益于鲁迅,对这些影响的分析和综合是很有价值的,但目前,研究者的努力与作家的文化实践之间相距甚远。从深度上说,对于以前的研究,有些要打破蔽障,重新认识,如鲁迅与儒家文化的比较研究,要充分认识到鲁迅对儒家文化在思想和行动上的悖逆,从而通过鲁迅揭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又如,鲁迅对道家文化的态度,鲁迅曾说过以“中国的精神根柢全在道教”之说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又说中国人往往憎和尚、尼姑、回教徒、耶教徒,不憎道士,懂得此道理者就懂得中国大半,这一思想虽有不少学者探讨过,但还大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顺便提及的是,孔子思想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儒生的阐释,几乎渗透到中国人的精神骨髓,鲁迅思想在中国当代的影响还只是较多地为进步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所接受。毛泽东所说的“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前者早已实现,后者尚须努力。有关鲁迅与孔子各自的普及化进程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大课题,很值得研究。

关于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史,本书是一次尝试,可能还存在一些不妥之处:资料搜集上可能存在遗漏;对于各个时期各方面研究的学术意义的把握,可能不很成熟;对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史规律和特点的总结,可能也有待商榷等等。

本书编著者期待着更多的同仁关注这一研究课题,以期使鲁迅更清晰地凸现于民族文化的坐标中,从而使鲁迅的精神火种代代相传。

编著者

2000.10.05 大连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滥觞与发展(1919—1949)

第一节	概述	(1)
第二节	鲁迅与古代文化	(3)
第三节	鲁迅与近代文化	(13)
一	鲁迅与清末小说	(14)
二	鲁迅与章太炎	(15)
三	鲁迅与王国维	(17)
第四节	鲁迅与现代文化	(19)
一	朦胧中的比较研究	(19)
二	鲁迅与周作人	(20)
三	鲁迅与郭沫若	(27)
四	鲁迅与林语堂	(29)
五	鲁迅与其他同时代人	(31)
1.	鲁迅与郁达夫	(31)
2.	鲁迅与胡适	(32)
3.	鲁迅与茅盾	(32)
4.	鲁迅与闻一多	(33)



5. 鲁迅与陈嘉庚	(33)
6. 鲁迅与王实味	(33)

第二章

整合与重构(1949—1966)

第一节 概述	(35)
第二节 主要研究成果	(36)
一 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	(36)
二 鲁迅与“对《武训传》的批判”	(41)

第三章

停滞与扭曲(1966—1976)

(44)

第四章

回旋与突进(1976—1990)

第一节 概述	(47)
第二节 鲁迅与古代文化	(50)
一 鲁迅与远古文化	(50)
1. 鲁迅与大禹	(50)
2. 鲁迅与《山海经》	(51)
二 鲁迅与先秦文化	(52)
1. 鲁迅与孔子	(52)
2. 鲁迅与韩非	(54)
3. 鲁迅与庄子	(55)
4. 鲁迅与屈原	(57)
三 鲁迅与两汉文化	(63)
1. 鲁迅与司马相如	(63)
2. 鲁迅与张衡	(63)



四	鲁迅与魏晋文化	(64)
五	鲁迅与唐宋文化	(70)
六	鲁迅与明清文化	(73)
	1. 鲁迅与《儒林外史》	(73)
	2. 鲁迅与《西游记》	(77)
	3. 鲁迅与《水浒》	(78)
	4. 鲁迅与张岱	(78)
	5. 鲁迅与吴梅村	(79)
	6. 鲁迅与《聊斋志异》	(79)
七	鲁迅与传统文化的总体比较研究	(82)
第三节	鲁迅与近代文化	(87)
一	鲁迅与龚自珍	(88)
二	鲁迅与严复	(91)
三	鲁迅与梁启超	(94)
四	鲁迅与王国维	(98)
五	鲁迅与章太炎	(101)
六	鲁迅与孙中山	(108)
七	鲁迅与秋瑾	(110)
八	鲁迅与清末谴责小说	(110)
第四节	鲁迅与现代文化	(116)
一	鲁迅与周作人	(116)
二	鲁迅与郭沫若	(152)
三	鲁迅与郁达夫	(178)
四	鲁迅与茅盾	(184)
五	鲁迅与胡适	(203)
六	鲁迅与林语堂	(209)
七	鲁迅与沈从文	(214)
八	鲁迅与丁玲	(215)
九	鲁迅与老舍	(218)
十	鲁迅与叶圣陶	(221)

十一	鲁迅与丰子恺	(223)
十二	鲁迅与曹禺	(224)
十三	鲁迅与王鲁彦	(225)
十四	鲁迅与许地山	(227)
十五	鲁迅与李广田	(228)
十六	鲁迅与冯雪峰	(230)
十七	鲁迅与瞿秋白	(233)
十八	鲁迅与毛泽东	(235)
十九	鲁迅与其他同时代人	(237)
	1. 鲁迅与李大钊	(237)
	2. 鲁迅与周文	(238)
	3. 鲁迅与杨杏佛	(238)
	4. 鲁迅与宋庆龄	(239)
	5. 鲁迅与闻一多	(239)
	6. 鲁迅与蔡元培	(241)
	7. 鲁迅与许寿裳	(242)
	8. 鲁迅与曹聚仁	(243)
	9. 鲁迅与其他当代文学	(243)
二十	鲁迅与中国现代小说综论式比较研究	(246)
第五节	鲁迅与当代文化	(256)
一	鲁迅与杜鹏程	(257)
二	鲁迅与高晓声	(258)
三	鲁迅与白先勇	(259)
四	鲁迅与其他当代文学	(261)

第五章

深入与拓展(1990—2000)

第一节	概述	(263)
第二节	鲁迅与古代文化	(265)
一	鲁迅与先秦两汉文化	(265)



1. 鲁迅与老子	(265)
2. 鲁迅与庄子	(267)
3. 鲁迅与孔子	(272)
4. 鲁迅与孙子	(273)
5. 鲁迅与绍兴先贤	(274)
二 鲁迅与魏晋文化	(276)
三 鲁迅与唐宋文化	(278)
四 鲁迅与明清文化	(280)
五 鲁迅与宗教文化	(282)
1. 鲁迅与佛教	(282)
2. 鲁迅与道教	(288)
六 鲁迅与民俗文化	(290)
七 综合比较研究	(291)
第三节 鲁迅与近代文化	(293)
一 鲁迅与龚自珍	(293)
二 鲁迅与严复	(294)
三 鲁迅与梁启超	(300)
四 鲁迅与章太炎	(307)
五 鲁迅与近代文学的综合比较	(308)
第四节 鲁迅与现代文化	(311)
一 鲁迅与郭沫若	(312)
二 鲁迅与胡适	(329)
三 鲁迅与周作人	(351)
四 鲁迅与郁达夫	(363)
五 鲁迅与茅盾	(374)
六 鲁迅与老舍	(384)
七 鲁迅与瞿秋白	(387)
八 鲁迅与沈从文	(396)
九 鲁迅与萧红	(402)
十 鲁迅与钱钟书	(406)

目 录

十一	鲁迅与毛泽东	(416)
十二	鲁迅与张爱玲	(424)
十三	鲁迅与张天翼	(427)
十四	鲁迅与胡风	(429)
十五	鲁迅与艾青	(431)
十六	鲁迅与闻一多	(432)
十七	鲁迅与朱自清	(435)
十八	鲁迅与高长虹	(437)
十九	鲁迅与穆旦	(443)
二十	鲁迅与赵树理	(445)
二十一	鲁迅与施蛰存	(447)
二十二	鲁迅与陈独秀	(449)
二十三	鲁迅与现代文化人群体比较	(451)
第五节	鲁迅与当代文化	(463)
一	鲁迅与新时期“寻根派”作家	(463)
二	鲁迅与残雪、余华、冯骥才	(465)
三	鲁迅与当代文化人综合比较	(468)

后 记





第一章

1919—1949

滥觞与发展

第一节 概述

1919年11月,吴虞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吃人与礼教》标志着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的开始。但严格来说,吴虞的文章从学术规范的角度看,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但他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发现了“礼教吃人”的主题,并以史料考证的方式找出中国历史上吃人的事实,所以只能说是从历史的角度来佐证《狂人日记》的主题,但此文也具备了比较研究的因子。从1919年到1949年的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从研究性质和成果来看,以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和1936年鲁迅先生的逝世为两个分界点,分为三个时期。

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以前的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还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也就是说,还是从“有比较才有鉴别”目的出发,所以这种比较研究还停留在朦胧印象式的直接表达上,多是随感式、片断式的评论。关于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比较研究,主要体现在思想和艺术上,其中茅盾、周作人和张定璜的评论,体现了鲁迅与古典文学比较研究的最高成就。周作人通过与《儒林外史》的比较,评价了鲁迅小说的艺术风格,提出了“冷嘲”和“热讽”的概念。张定璜的《鲁迅先生》中所涉及的关于《狂人日记》与《双桡



记》、《绛纱记》等《甲寅》上发表的旧小说相比,评价了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这是比较意识明确的研究文章。茅盾作为一个专业评论家,他比较性的评论,大都体现在鲁迅与现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上,但一般都是把鲁迅的作品与当时各种刊物上发表的小说简单地比较加以评论,不具备专题比较研究的性质,只是随感式的,还没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

1928年以前,还没有形成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的学术规范,但在星星点点的评论中,却多有闪光点,当时茅盾、张定璜、周作人等人的一句具有真知灼见的定论,都有可能成为后来这个领域的一个专题。所以这一时期,标志着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的滥觞,为后来的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奠下第一块基石。

192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与研究也充满了火药味。国内战争、外敌入侵、内忧外患的形势使得知识分子也变得浮躁起来,也无法安静下来。所以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多是因时事的需要进行的,所以较少有纯文化上的研究。在鲁迅研究方面也是一样,反动文人对鲁迅进行肆意攻击,鲁迅本人和同一战线上的战友也是奋力回击,这样双方的文章都有强烈的政论色彩。

鲁迅逝世后,中共中央唁电全国,对鲁迅做出了高度的评价,直到这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如郭沫若等人才彻底消除了宗派主义情绪,开始真正认识到鲁迅的伟大,才发现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座文化高峰的丰富性。于是鲁迅研究也随之深入。研究者开始从思想、艺术等方面注意到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出现了鲁迅与庄子、韩愈、章太炎、王国维等一批专题性比较研究的著作,这标志着鲁迅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到了40年代郭沫若的《鲁迅与庄子》、《鲁迅与王国维》的出现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学术规范的基本形成,巴人等人的比较研究的文章也有较高的成就。从这一时期的比较研究文章来看,这些比较研究的文章基本是从鲁迅的本体出发,并且荟萃了不同阶级、不同信仰、不同政治立场的各个阶层知识分子的研究文章,所以这一时期的鲁迅与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是立体的。这一时期,鲁迅与中国文化比较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学人对鲁迅的复杂性认识还不够深入,基本上还是从反封建、战斗传统、爱国主义等层面去认识,虽然这是



鲁迅思想的主导方面,但不是全部,所以这时的研究也未免失之于片面,对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挖掘仍有待深入。

第二节 鲁迅与古代文化

鲁迅“从旧垒中走来”,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制高点,透视鲁迅能够管窥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如果想真切地读解鲁迅,也必须把鲁迅放在民族文化的坐标中定位考察,所以通过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比较研究,来读解鲁迅,反观历史,是历代学人常用的方法。

鲁迅最初是以小说《狂人日记》而蜚声文坛的,所以最初的评论性文字也是针对《狂人日记》而发的。在最初的随感式的比较文字中,吴虞于1919年11月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的《吃人与礼教》,是一篇具有比较研究雏形的学术性作品,在当时影响颇大。

吴虞的《吃人与礼教》,用历史的事实来印证《狂人日记》的主题思想。吴文从史书中找出齐侯、汉高祖、臧洪和张巡既讲礼教又吃人的历史。

首先是齐侯。《左传》僖公九年,“襄王祭文王武王之后,指祭肉分给齐侯,说齐侯年老,可以不必下拜,讲君臣礼节。而齐侯却说:‘天子如天,监察不运,威严常在颜面之前,不敢不拜。’”文中说,由此可见齐侯讲礼教到如此地步。但吴文又按《韩非子》考证:“易牙为君(齐侯)主味。君之所未尝食,惟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进之。”由此吴文指出,“表里相差,未免太远”,这类人“在历史上,在社会上却占了好位置,得了好名誉去了。”

其次是汉高祖。《汉书》高祖二年,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刘邦虽为大流氓出身,却亲为发丧,兵皆素缟,确是守名教纲常,最重礼教。但十二年,项羽欲烹太公,刘邦却要“幸分给我一杯羹”。所以吴文认为,高祖是一面尊孔子,一面吃人肉。

第三,臧洪和张巡。臧洪“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史家反称为“壮烈”。张巡亦杀其妾,以食军士,后食人口二万。吴文说:“越自命忠义之人,好吃人的胆子越大。”吴文归结说: